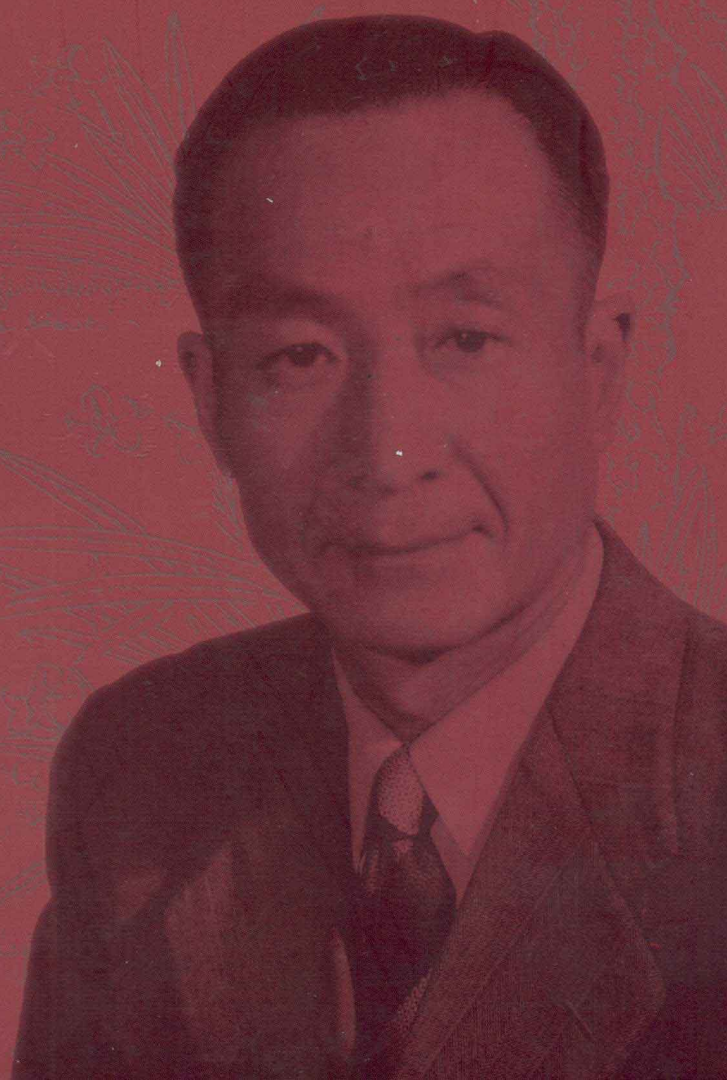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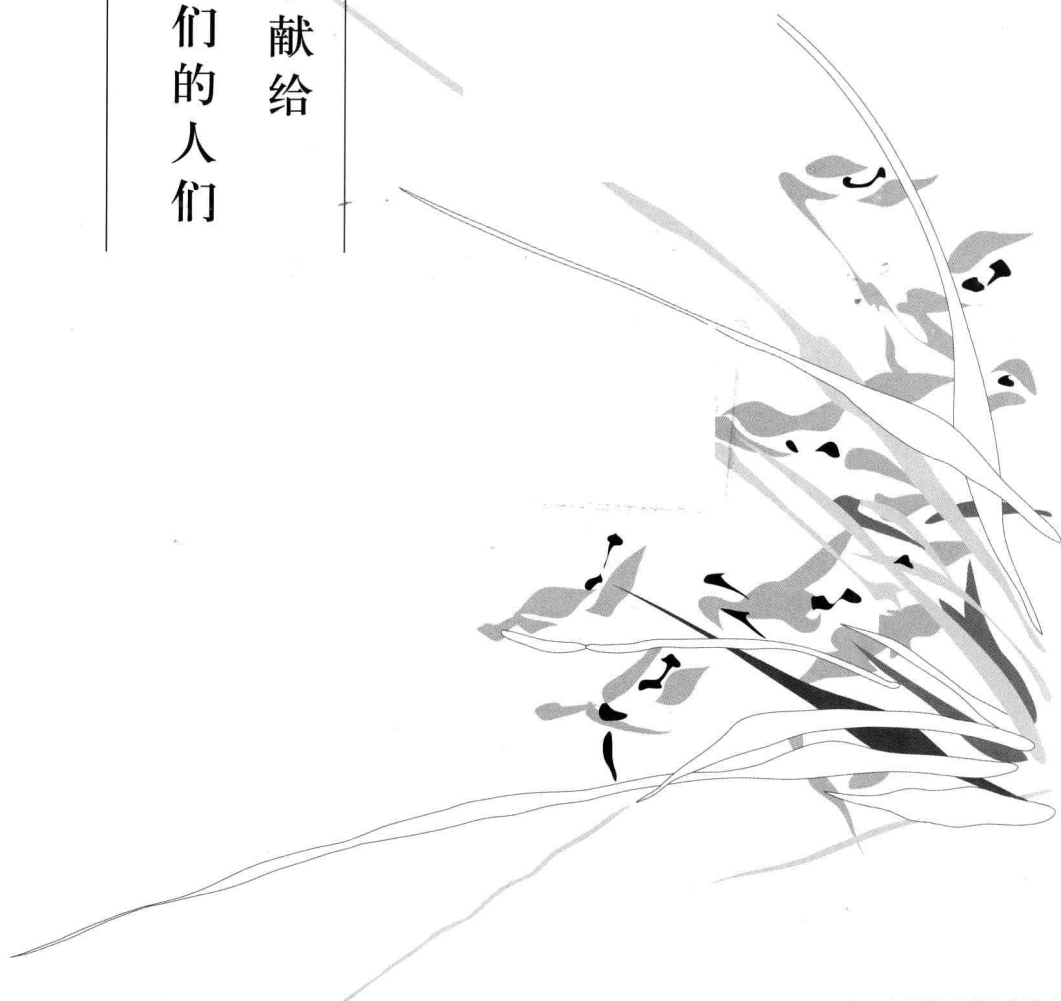


我們的父親吳征鑒



缅怀双亲百年诞辰，
仅以此书献给
敬爱的
母亲 李元昭
父亲 吴征鉴
及热爱他们的人们



【目 录】

• 生平事迹与纪念文章

深切怀念我们的父亲吴征鉴		1
吴征鉴的简历、主要成就与贡献		7
我的遗愿		9
给家人的一封信		10
一个普通党员的遗愿《人民日报》		12
大彻大悟者的“遗愿”《人民日报》		13
中国医学科学院讣告		13
我国寄生虫病和医学昆虫学专家一级教授吴征鉴同志逝世《健康报》		14
寄生虫病和医学昆虫学专家吴征鉴教授在京逝世《光明日报》		15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吴征鉴同志逝世《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		16
尽心竭力五十年 吴崇其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健康报》	17
悼念吴征鉴同志 王兆俊		21
痛失益友 毛守白		22
挽联		22
学识渊博待人诚挚的良师益友 赵慰先		23
给老师同学的一封信 易有云		24
悼念恩师吴院长 王醮标		25
师表的楷模 王福彭		26
怀念征鉴老师 冷延家		27
纪念诲人不倦关心备至的鉴翁老师 黎明达		28
悼念敬爱的征鉴老师 沈一平		29
深切的怀念 洪静婉		30
深痛悼念吴征鉴老师 杨兆莘		30
怀念吴院长 冯兰湘 丁绍铎		31
向最崇敬的吴征鉴老师致敬 吴之芳		32
踏着吴老的脚步奋勇前进 朱静和 谢醒民		32
悼念吴院长 王捷		33
言传身教 后继有人 乐文菊		34
吴院长仍指导我们实现消灭寄生虫病的宏愿 邵葆若		35
他的音容常在——怀念敬爱的吴征鉴老师 刘德山		36
亲切教导 平易近人 胡昌仁		37
诲人不倦 为人师表 黄庆广 沙人珏		38
教诲长存 永志不忘 叶弈英		38
怀念敬爱的老师——吴征鉴同志 陈光裕		39
院校庆有感——饮水不忘掘井人 陈妙兰		41
难以忘却的怀念 吴仲璋		43
王兆俊、吴征鉴合著《黑热病学》书照		44
吴征鉴、王兆俊等合著科学技术报告《消灭黑热病传播媒介——中华白蛉的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书照		44
吴征鉴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书照		45
《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和《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刊登吴征鉴传略书照		
卫生部颁发给吴征鉴的荣誉证书照片		46

• 诗词与书法

无题三首	47
建党四十周年纪念	47
病房	48
感剑言老人赠诗	49
读黄夫人“夏日忙”有感	49
答黄林二老赠诗	49
念梅畹华同志	50
喜苏联两次发射载人宇宙飞船胜利归来	50
病愈出院欣然赋诗	50
欣晤林老并感和诗	51
答林老问二则	51
寄答林老	51
北海巧遇，同游同归，承赐大作，试步原韵答谢	52
新年有感	52
无题二首	53
观现代京剧	53
和友人诗	53
嘲修正主义者	53
七律 喜国庆前夕获得解放	54
水调歌头 热烈庆祝建国二十周年	54
献给全国科学大会 附吴征铠和诗	55
东风第一枝 迎接科学的春天	56
为第一届高师班同学通讯录题诗	56
七十有一 自咏	57
贺泽云女四十岁生日	57
满江红 恭祝建党六十周年	57
千秋岁二首	58
辛酉秋末一二届高师班同志约叙于南京钟山宾馆	59
辛酉鸡年，诗以述怀	59
敢于四化投全力 —— 读吴征鉴同志两首诗的感想	60
七律两首 附一、二届高师班学生和诗	61~62
满江红 庆祝党的生日	62
病中杂咏三首	63
书法作品之一 录毛主席诗词 沁园春 长沙	64
书法作品之二 献给全国科学大会	64
书法作品之三 鉴翁自咏诗与学生和诗	65
书法作品之四 泽云四十生日作诗为贺	65
书法作品之五 为《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题写刊头	66
书法作品之六 辛亥秋末一、二届高师班同志约叙钟山宾馆，对诗	66
李元昭遗留的唯一篆体书法作品	67

钱昌年

• 影像集萃

解放前学习与工作照片	68~73
解放后工作照片	74~98
家庭生活照片	99~111

深切怀念我们的父亲吴征鉴

——纪念双亲诞辰100周年

茫茫岁月，百变世纪。

今年我们几位年过古稀或花甲之年的子女，相聚相忆在一起，来纪念我们已去世二十七年，又适逢百年诞辰的父亲，深切缅怀他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衷心颂扬他高尚的共产党人的思想品德，这不仅是对我们子女一代的巨大激励，也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崇尚教育与鞭策。

我们的父亲吴征鉴，字若水，江苏扬州人，1909年农历5月23日出生于天津，1982年9月19日病逝于北京。193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获理学士学位，青年时曾赴新加坡、印度留学进修。生前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党委会常委、一级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寄生虫病学和医学昆虫学专家。

为消灭黑热病作出开创性重大贡献

黑热病曾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五大寄生虫病之一，在我国有近百年流行史，波及16个省市，据1951年的调查统计，全国约有53万患者。抱着“科学救国”为疫区百姓解除疾苦的理想，1933年父亲毅然辞去条件较好的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助教一职，进入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任职，加入到对黑热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中，直至1939年。此间他长期深入苏北淮阴各县的疫区农村，调查黑热病（俗称“痞块病”）的发病原因、发病率、流行状况，研究其感染途径，寻找传播媒介。他发现凡有黑热病流行之地，必有一种称为“白蛉”的昆虫，且发现“中华白蛉”是当地优势蛉种。中华白蛉有家栖息性，常栖于大门过道、墙角、厕所。父亲不顾脏和累，深入这些场所捕捉白蛉，解剖吸了人血和病人血的白蛉，从而证实在白蛉胃中有自然感染黑热病的原虫前鞭毛体，并将此接种到实验鼠腹腔中，成功地制作成黑热病动物模型，又以自然感染的白蛉叮咬正常的实验鼠，证明了“中华白蛉”是黑热病传播的主要媒介。这一成果使他成为最早论证“中华白蛉”是黑热病传播媒介的元老。1940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父亲辗转在云南、贵州、四川等贫困地区，从事疟疾防治研究工作。1946年返回江苏至1949年解放前夕，他担任苏南、苏北地方病防治所所长，继续在广大农村从事以黑热病和血吸虫病为主的寄生虫病防治研究工作。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和人力物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让他有大的作为，只是这种艰苦磨练，让他更贴近百姓，并为解放后大力开展黑热病防治工作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黑热病被国家列为《农村发展纲要（草案）》中限期消灭的疾病之一，父亲终于可以实现多年心愿，心情极其兴奋。1951年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将此重任交给他担任主要领导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会上他结识了刚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王兆俊教授（后担任山东黑热病防治所所长），从此他俩成为为共同事业携手奋斗，肝胆相照的挚友。

消灭黑热病的会战首先从山东打响，他们一面培训专业人员，一面深入疫区调研，无论实验室科研、临床实践、还是现场考察，父亲都亲临第一

吴征镒与白蛉

线动手或指导。由于白蛉趋弱光，有在黎明和黄昏出现的特点，父亲不怕苦累，常起早贪黑往返十余里，钻牛棚、茅厕捕捉白蛉并饲养、解剖、分类，以摸清白蛉的生态习性、繁殖期和黑热病流行规律，并对用杀虫剂灭蛉方法进行试验，获取大量有用数据和资料。到1958年，流行严重的山东、江苏等七省区基本达到消灭黑热病的要求，患者从53万降至1万左右。这一重大成果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父亲和吴征铠（中科院院士、物理化学家）、吴征镒（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兄弟三人参加了大会。聆听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后，在小组会上父亲即兴赋诗：“阅历沧桑近古稀，长征迈步未为迟，神州锦绣拥花簇，赤县辉煌映彩霓。老骥驰骋千里志，新军赶超一心齐，空前盛会感温暖，继往开来举大旗”。吴征铠、吴征镒写诗相和，媒体争相报导，一时传为佳话。

精心培养专业人才 桃李满天下

受国家卫生部委托，1951-1953年间，父亲主办了两届寄生虫病学高级师资班（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班）。他亲自组织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参与讲课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授课，采取课堂教学和现场实习相结合，现场实习和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组织学生深入寄生虫病流行疫区参与防治，并亲临指导。在结业阶段，对如何搜集文献，整理分析资料，撰写毕业论文的格式、内容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这批新生力量不仅在当时消灭黑热病的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后来成为我国高等医药院校和研究院所的骨干力量，

1981年父亲因公来南京，与在宁诸生十余人聚会时赋诗：“今逾七十已非稀，犹有童心未觉奇。身似飞鸿数南北，神怡骏马忽东西。敢于四化投全力，愿向群英献小诗。莫笑老翁尔何苦，党人天职竞先驱。”诸生和诗曰：“童心七十古今稀，半百诸生会亦奇。常怀四化游旧地，闲论五洲笑日西。造极昆虫寻接力，攻关血症谱新诗。勇当天职情难老，试看谁能紧追驱。”表达了为建设四化、造福人民而共同奋斗的师生情谊。

优秀的医学科研组织管理者

父亲不仅是著名的学者专家，也是位富有组织才能，善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在解放后主持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工作期间，他提出了“立足任务、结合学科”的主张，并以五大寄生虫病的防治为主要任务，按病设立机构，结合学科开展研究。同时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来自北京、南京、海南等各地区人员及国外归来的专家学者，统一思想认识，确定以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为主攻方向，并坚持每年有三个季度深入疫区，将科研和现场防治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各人所长。同时在国内五大寄生虫病流行区建立协作网，及时了解疫情动态，指导防治工作，并从实践中检验科研成果。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订《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父亲作为医学界代表参加了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2年科学规划工作，又参加制订了《1963-1972年全国医学发展规划》工作，并任会议秘书长。

1959年9月父亲被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组建并担任科研处处长，后升任医科院副院长，并兼任医学情报所所长。他专心致志地把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于组织和领导医学科学研究上。此外，他还长期兼任国家科委预防医学专业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疟疾专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方地方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和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1973年5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第26届世界卫生大会。父亲以顾问身份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大会。他曾先后访问过苏联、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考察科研工作的组织管理，促进了我国医学界与世界同行的相互学习与交流。1982年在他重病期间还受聘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特别计划顾问。

父亲参加国际会议，一般无需配翻译人员，常由他亲自语译及编译各种文件，常常看到他在一台小小的英文打字机上工作到深夜。回国后，又是整日整夜写汇报材料，写心得体会，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学术财富

父亲学识渊博，造诣深邃，论著颇丰。他与王兆俊合著《黑热病学》一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出版），还与王兆俊等人合作共同完成科学技术报告：《消灭黑热病传播媒介-中华白蛉的科学依据及其实际效果》（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出版、1964、6北京），他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一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出版）。发表论文52篇，其中有关黑热病及其传播媒介白蛉方面的32篇，疟疾及其传播媒介蚊种方面的6篇，血吸虫病及其传播媒介钉螺方面的5篇，丝虫病、肠道寄生虫病及杀灭蝇虱等方面的8篇。

在学术成果方面，父亲与同行合作从不计名利得失。他常说：“我们的责任是看研究报告的科学性，是否有道理，不必计较挂不挂自家的牌子”。与王兆俊合作编写《黑热病学》一书时，他无私地将自己从3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的资料全部提供给对方参考，而对方编写时亦点滴不漏的将父亲做过的工作纳于书中，出版时父亲只在“白蛉”部分署名，而在王兆俊执笔的“黑热病”部分只单独署了王的名字。全书署名顺序经再三推让，王在前，吴在后。他们互相谦恭礼让的事迹感人至深，在业内广为传播，两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

父亲不仅留下极有价值的学术论著，他的人品更为人称颂和尊敬。1956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始终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使人都乐于与他交往。他视弟子如子侄，政治上关心，业务上

帮助，还曾为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学生平反，落实政策费尽心力，而对自己在“三反五反”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误伤，泰然处之，从不计较。

乐观人生 广交益友

生性乐观、自娱、娱人犹如天河般个性是我们父亲为人的一大特点。

记得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一直随单位从事疟疾防治工作，从长沙辗转广西到昆明，又经贵州到重庆的艰难路程上，因频遭日机轰炸，只能夜间行车。一天在朦朦天亮时刻，横卧在敞篷大卡车上的父亲，足背部被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上的雨棚挂钩连鞋带肉刮走一大块。家人只能暂停前进，在一个无任何医疗条件的山区小村里静养数日。当时的自然环境非常差，苍蝇蚊子成群，创伤感染的几率极大，但是父亲反倒安慰母亲，要母亲把幼小女儿照管好是最重要的事。他自己清创换药驱赶蚊蝇，白天夜里都不能休息，最后遗留下跛脚，有点行动不便。但父亲从没让人感到他是跛脚，他行走速度很快，健步如飞，照样打网球，跳交谊舞，我们无人能及。

在重庆郊区从事热带病研究工作期间，每逢周末，我们家小小的一间屋，就变成了当时的“京剧院”，锣鼓齐鸣，京胡优雅的旋律伴着花脸、青衣、花旦及老生各种段子，仿佛让人们忘却了苦难和沉沦的时运，为山区的空域带来阵阵欢乐。我们的父亲既是活动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也是参与者，他自拉自唱，拿手的就是青衣花旦，拉琴时他总是将头偏向一侧，专心致志地拉，还会不停地唱。活动结束后他会把心爱的胡琴左擦右擦，上好松香放进布袋挂在床头墙上，在那种时刻，谁能想到他是一位医学家呢！父亲喜爱京剧，有大家庭的影响，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我们的祖父就是京剧票友，常登台演出；大伯吴白匋系南京大学教授，剧作家，几位叔叔都擅长京剧、昆曲，兄弟相聚之时，常会清唱一段，切磋技艺，其乐融融。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担任苏南地方病防治所所长期间，在苏州木渎灵岩寺，为众多寺僧长老治疗疟疾和丝虫病，受到山寺众僧的感激和尊敬。

解放初期，在组办两期寄生虫病学高级师资培训班期间，父亲对年轻的专业人才充满爱护和关怀，把每位学生都当做朋友。为了让学员学习不至于紧张，每逢周末他都举办一些座谈会、聚餐会、晚会等等，利用文娱表演充分活跃气氛，他总是积极带头演出。他还编了些歌颂新社会的新词快板书，让年仅五岁的幼子立文登台说快板，当时来说，的确新鲜有趣。

父亲为人正直、豪爽、大方、不谋私利，善结朋友，平易待人，没有架子都是他非常突出的优点。他常言道：“家境贫富，并非金钱左右”。“心地宽宏，小路也可变成大道”。“快乐绝非仅有于私乐，要事业乐，朋友乐，家庭乐，国家世界乐，绝非易事”。

文革期间，父亲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锻炼，那时他已过花甲之年，但和年轻人一样焕发着革命的热情。小儿立文部队复员去干校探望他，等到天黑才见他回来，只见他拉着板车与同事有说有笑，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随着一声军号，他又和大家一起跑步去了。大家都亲切的叫他“老吴”。

父亲身为一级教授，享受着当时的高工资，这使父亲一直惴惴不安。党和国家给予这样的高待遇，如何回报是他一直考虑的问题，他和立文在田间地头促膝谈心，计划把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交，他想的是只有这样，才能心安，只有这样才能和广大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做知心朋友。

父亲非常好客，在家举办家宴款待各方朋友是他乐意做的事，好在母亲和泽奎都有上乘厨艺。一位美国檀香山大学的热带病学家是他在中美互访时结识的好友，除了接待对方来家做客外，当得知对方有集邮爱好时，父亲还搜集和购买邮票寄往美国，为朋友助兴。父亲有一本视为珍宝的索引册，上面工整地记录着各方友人的国籍、地址、通讯方式，每年元旦等重大节日，他都铭记着亲笔写贺卡、发短信或邮寄小礼物给世界各地他所结识的外国专家朋友。他这样做，不仅出于礼貌，更是以友谊友情为重。

父亲诚恳待人，也得到他人的敬重，在他病重期间，王兆俊专程从山东来京探视，他的挚友毛守白（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赵慰先（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博导）从外地赴京，也都到医院看望他。国际友人马海德探望他时，两人拉着手亲切交谈，马海德还抚摸他的双脚，轻轻地捏他的脚趾，使人自然感到他们的亲密无间和深情厚谊。医科院科研处原来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当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时，个个悲痛万分，泣不成声。

言传身教 家庭美满

父亲一九二九年初与母亲李元昭结为伉俪，育有四子一女。李元昭，字俊明，一九零九年农历二月十八日生，江苏丹徒人，在扬州“个园”读书长大，系大家闺秀。除抗战期间短暂担任中华医学会干事公职外，主要在家相夫教子，支持父亲工作。在那战乱的年代，随父亲流离颠沛，历尽艰辛。父亲事业有成，母亲功不可没。母亲聪颖、自信、娴淑，善诗文，精篆书。在北京居住期间，常与邻居林剑言（林则徐曾孙女）老人，对诗叙友。当年老家堂屋里挂的中堂、对联，出自她的手笔。扬州常有向她求取墨宝者。现仅存“花好月圆人寿”六字，成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对子女的爱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是位对子女不善表面亲热而内涵极深的人。对子女的未来和发展，一向严教为本，身教为先。以父亲一生对工作的敬业而言，从不请病假事假，从不迟到早退，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这些子女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长子昌文，次子泽量在抗日战争期间，大约有七、八年没有与父母一起生活，而是留在老家扬州由祖母照应。当时国难当头，父辈兄弟六人都去了大后方，留在老家的都是妇女和孩童，坐吃山空，变卖度日，家境每况愈下，生活陷入困境。日本投降后，父亲由重庆返回南京，举家到扬州探亲探子。父亲考虑到昌文今后的学习和发展，在家只待了短短数日，便一人带着昌文前往南京，看了学校，见了世面，沐浴了父子的亲情。返回扬州时，昌文已面貌一新，穿上别致的新装，还梳着油亮的分头。除昌文自己得意之外，也招来当时大家庭众多小孩的美慕。

建国不久，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长子昌文光荣参加了革命，后来

成为南京政法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次子泽量参军入伍，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先后参加过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战争，转业地方后，在组织部门工作，后来任南京市老干部局局长。三子泽奎继承父志，考入浙江医学院，让父亲甚是得意。泽奎一九八二年赴美，从事抗癌科研工作，是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女儿泽云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军队科研单位工作，系正师级研究员。小儿立文从军医大学毕业，在军中服务多年，退役后，数度留学日本、美国，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博导，成为中国抗癫痫领域的领军人物。儿媳和女婿都受过高等教育，长媳濮存恬是大学教授，二儿媳徐佩珍是国家公务员，三儿媳潘炯琰、小儿媳肖淮海都是医生，女婿耿世璋是高级工程师。正如父亲在遗留给我们的信中所说：“儿女喜成器，群孙秀可期”“我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始终是感到幸福和少见的。……有时不觉笑出（声）来”。现在五个子女中有三人退休离职，泽奎、立文二人仍在医学战线上拼搏，可谓父亲后继有人。我们五个子女没有辜负父母亲的养育教诲，但我们同感，我们工作的业绩和对国家的贡献远远不及父亲那样高、那样大。

1982年父亲确诊癌症，手术住院期间，正值三子泽奎取得自费访美签证，在离境期限快到之时，父亲与三子恳谈，建议不要考虑他的病情，应按计划如期访美。在他喃喃低声含泪的嘱咐中，将一盘录音带递到三子手中，他言道：“应抓紧机遇，好好珍惜自己的人生，要克服困难，要寻求上进。如若真正遇到困难时，可按录音带上的人名和地址去找波士顿MIT（麻省理工学院）某教授（他的挚友）帮忙，将录音带放给他听，这是最后的一步了……。”9月19日，也就是泽奎踏上美国的第九天，父亲就溘然长逝了。

当父亲得知自己病情已转移治愈不易后，即请求组织不必再为他输血和使用贵重药品，将药留给更为需要的人。他把长子昌文叫到病榻前，拿出两封遗书，一封是给组织的，一封是给子女的，交代在他过世之后才可拆阅。在他亲笔向党组织写下《我的遗愿》中写道：“马克思召见我，我只好去，可惜未免早了点……”，他请求党组织接受他的几点要求：将遗体献出供科研教学之用，死后不开追悼会，骨灰送到北京西郊西北旺药用植物园，给芍药花提供化肥，家人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遗书深切感人，曾摘登于1982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给子女的遗书中，表达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要我们悉心孝敬母亲，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的遗愿得到母亲和子女的尊重和支持。

我们的父亲是极有诗情画意的人，他留下了不少诗词，他的书法虽不成名，但字迹清秀豪放，整齐流畅，字如其人，就像他为人那样的易于亲近，受人喜爱。父亲病前给每个子女都写了幅诗词：“莫笑老翁尔何苦，党人天职竞先驱”，用的是湖州石墨，砚台是家传古砚。上面有每个子女的姓名，下款记录了何年、何月、何日父字。

今年是父亲和母亲百年诞辰，我们五个子女都先后到北京西北旺药用植物园祭扫追思，看到埋有双亲骨灰的两棵松树结成连理，生长茂盛，枝叶相连，松果累累，无限感慨。昌文写了一首短诗，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心情：百年诞辰祭双亲，松结连理天有情。感恩怀念眼含泪，遵行教诲慰天灵。

亲爱的父亲啊，我们对您和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我们和我们的儿孙共四十余人向您和亲爱的母亲默哀致意，深切缅怀。您是人民的科学家，您是优秀的共产党人，您是我们永远的楷模。您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做出的光辉业绩，您崇高的人格形象将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

昌文 泽量 泽奎 泽云 立文

二〇〇九年九月

【吴征鉴的简历、主要成就与贡献】

吴征鉴 男 江苏扬州人，生前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党委会常委、研究员（一级）专业与专长是寄生虫学及医学昆虫学。

主要学历：

1923年至1925年5月在江苏扬州私立美汉中学读书

1925年8月至1931年1月 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动物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1935年4月至9月 新加坡国际疟疾研究班进修

1945年4月至9月 印度加尔各答热带病学院、印度德里疟疾研究所及印度孟买霍夫金研究所进修。

主要经历：

1931年至1933年6月 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助教

1933年7月至1939年8月 中央卫生实验处技佐及技士（江苏淮阴）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 云南省疟疾研究所技正

1942年2月至4月 滇缅公路抗疟疾团专家

1942年5月至12月 滇缅公路卫生处技正

1943年至1949年5月 中央卫生实验院（重庆、南京）技师并于1946年至1949年中兼任苏北、苏南地方病防治所所长及黑热病防治处副处长

1949年5月至1956年10月 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南京）

1956年11月至1959年8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副所长（南京、上海）

1959年9月至1978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研究处处长（北京）

1978年至198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医学情报所所长（北京）

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方面主要成就与贡献：

1931年吴征鉴毕业于金陵大学，在该校任助教两年以后，一直在卫生部门从事人体寄生虫学及医学昆虫学的科研工作。其主要情况如下：

（一）黑热病及其传播媒介白蛉的调查研究：1934年至抗日战争前，在中央卫生实验处淮阴黑热病研究队工作，到苏北各县病区，调查了解白

蛉的种类、生态及其与黑热病传播关系，发现中华白蛉是当地优势蛉种，有家栖习性，利什曼原虫的自然感染和人工感染率都很高，通过动物试验证明该种白蛉是黑热病主要传播媒介，并找到了这种白蛉在室内孳生习性，此外还发现了苏北的新种白蛉“江苏白蛉”。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在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收集白蛉，说明南方也有中华白蛉存在，但为少见品种，不足引起黑热病的传播，多数白蛉均为平卧毛类不吸入血的野栖蛉种，还发现了若干新的蛉种，并进行了描述。解放以后，1950年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明确了加强五大寄生虫病的调查研究，积极制定了防治措施，黑热病是其中之一；当时调查统计全国有五十三万病人，提出了防治工作必须采取消灭病原和传播媒介的综合措施，其中灭杀白蛉是一个重要环节。于是，吴征鉴教授主管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1956年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与王兆俊教授主管的山东黑热病防治所（以后改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密切合作，培训科技人员，深入病区现场，开展调查研究，查明了中华白蛉的生态习性。根据其生活史中的薄弱环节，采用了六六六、二二三或二者混合的杀虫剂以及不同喷洒方法进行了灭蛉试点实验，取得了显著效果。此后，他们和北方流行黑热病的省、市自治区基层防治机构及广大科技人员密切协作，每年深入各地病区，坚持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查明各地中华白蛉生态习性上的共性和特性，总结灭蛉经验，因地制宜的推广应用灭蛉方法。至1958年，原来黑热病流行严重的六个省、市已宣布基本上消灭了黑热病。这一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奖励。国际上对我国这一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36年至1964年中，吴征鉴教授对黑热病及媒介白蛉的科研方面，共发表了论文32篇，并于1956年和王兆俊教授共同编写出版了以国内资料为主的《黑热病学》一书，还在1959年联合提出了根除我国黑热病的建议，呈送卫生部参考。1959年，吴征鉴教授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科研处处长以后，他仍关心国内黑热病及媒介白蛉的研究，进行技术上的指导。1977年受卫生部委托，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黑热病防治科研座谈会，197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为我国根除黑热病提供技术措施而努力。

（二）疟疾及其传播媒介蚊种的调查研究 1933年在南京作了传疟蚊种中华按蚊的全年生态及自然和人工感染的观察，并选择南京近郊一个地区进行了巴黎绿杀灭中华按蚊幼虫的实验。抗战期间，于1938年在广西卫生部华南防疫团参加该省疟疾调研。1939年至1942年间，参加云南省疟疾研究所工作，在滇缅公路的芒市、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按蚊种类及主要传疟蚊种的调查，取得比较完整的资料。在我国，首次发现了“蛋形疟原虫”的感染和一种新的按蚊“贵阳按蚊”。在疟疾及蚊媒研究方面，吴征鉴教授先后发表论文6篇。1981年卫生部成立了疟疾专题委员会，吴征鉴教授任主任委员，他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一年内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和国内有关的科学家一道，通过同行评议，共同制定了国家重点医学科研计划及疟疾防治研究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全国力量，分工协作进行调查研究，为控制疟疾流行作出贡献。

（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进行了苏北高邮湖区及苏南苏州木渎、嘉

定等地日本血吸虫病的调查研究。解放初期，由于南下部队在苏南集体感染了血吸虫病，曾组织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同志并亲自参加了驻军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治和宣传教育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血吸虫病及其传播媒介钉螺研究方面，吴征鉴教授先后发表论文5篇。

（四）对丝虫病、一般肠寄生虫病以及使用杀虫剂灭杀蝇虱等方面曾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共发表论文8篇。此外，吴征鉴教授于1959年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部担任业务行政工作以后，在科研组织管理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还参加了北京市科学学研究会任理事，开始对这门新的学科进行研究。

我的遗愿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 1982年10月11日

编者按：吴征鉴同志在生命垂危时写下《我的遗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交给了党组织，表示了他对他人、对他所从事的医学科学事业的热爱和关心。这篇遗愿反映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和老科学家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份难得的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教材。在看望吴征鉴同志的时候，林士笑同志说：“您作为医学昆虫学家，在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方面做到了全力以赴。你为人民的健康，为战胜黑热病及其媒介白蛉所作的重大贡献，对防治疟疾、血吸虫病做出的重要成绩，对科学管理、培养科研人员积累的经验，党组织是知道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是党组织对征鉴同志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要学习吴征鉴同志把毕生精力，连同生命、躯体全部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在四化建设中，为开创医学科学事业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 • •

马克思如召见我，我只好去，可惜去的未免早了些。许多能够为党做而又应该做的没有能做，很感遗憾。身后之事，还是早些交代为好。免得垂危之际，有话说不出。我的遗愿如下：（一）去世之后，赶快做尸体解剖，希望利用它作为研究材料，不仅要查明死亡原因，而且能找出发病原因。最近我的一个内弟和一位革命老同志都死的不明不白，身前做了各项检查和会诊，说不出是什么病，可见我们医学技术水平还不高。我想尸体解剖如能做得多，做得细，再和病例的生前病历结合起来分析研究，一定能为今后诊治疑难病症提供新的技术和经验。还可以研究别的问题，收集教学标本。例如我的肺部结核钙化点多得很，病变发生在二十岁前，但我没有出现肺病症状，而是在大学毕业后查体时才知道的，这是为什么呢？可以留下这个标本研究研究。所以我希望把我身上值得研究或保留的东西都利用起来，这也是我在身后对提高医学科学水平应尽的一点责任。尸检要大力提倡，不仅要宣传教育，同时，国家也可以制定一些法令，至少要求对病因不清，死因不明的病例一定要做尸检。（二）在尸检后，留下的臭皮囊还有什么用呢？那就把它火化，变成有机肥料。但有一点希望改变，现

在火化已为广人民所接受，可是一般还要为死者穿戴一番，甚至要买一套新的，否则好像对不起死者。我看既然是烧，赤裸裸的岂不干脆，能穿的衣服洗洗干净，别人还可以穿嘛，何必浪费掉呢？所以我主张这样火化，开个先例。骨灰不用买盒子装，塑料袋一包就近送到西北旺药用植物场洒作肥田粉。如果要纪念我的话，每年药场赤芍盛开时，买几朵放在瓶里看看，就好象看到我在花丛中，拍下的那些彩色照片神气活现。见花如见我，岂不妙哉！（三）绝不要开追悼会。这已成为习惯，好像很简单，却白白的花掉不少人、财、物力，几百个人去八宝山，大小汽车上百辆，光汽油费就可观了，不开大可节约，遗体告别，更应取消。要举行就得把死者打扮一番，前面已说过是无意义的浪费，何况死者已无所知，而生者见到遗体，徒增伤感，大可不必让许多亲友难受，甚至痛哭流涕嘛！至于一个人离开人世，当然要通知大家一下，但方式越简单越好，发个讣告就行了。如果搞个悼词，我也有点看法，现在它已经有点公式化、形式化了，对一个人的评价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死了，尽说好话，歌功颂德，其实并不怎么样，世上没有完人，对毛主席还评功过呢，写时应一分为二，恰如其人，不加渲染，这样对后人才有教育意义。现在总说某人之死是个“重大损失”，我说除革命老前辈为党和人民作了卓越贡献者外，一般人不必都这么说，个个如此，这句话就庸俗化了。再如“化悲痛为力量”，化成什么力量，说了无用，岂非空话，还有个“学术道德”问题应引起重视，如不及时进行教育，树立表彰那些优良学风，对医学发展极为不利，贻害无穷。（四）关于我家庭安排，我已留言给子女们，我的老伴年老体弱，要他们坚持一个“孝”字，让她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上照顾，按章行事，不能特殊，我再三叮嘱家人不准提任何要求，使组织上为难，请放心。总之，人总有一死，“死”了死“了”自然规律逃脱不了，不应铺张浪费，而应一切从简。敬请党组织接受我提出的遗愿。

一个普通党员

吴征鉴 手术前留言

一九八二年四月

【给家人的一封信】

亲爱的昌文暨诸儿、媳、女、婿和全家老小们！

我深信这次手术预后是会好的，但也不能不想到万一有意外之事，我想还是把我的一些意见留信给你们，以免垂危之际，说不清楚或者不能说了，如能恢复康健，这个信也可作为历史性的材料存着。

我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始终是感到幸福而少见的，因为这么多的成员中，第一代至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没有一个败类或是品德不好的人，个个都想上进，特别是孙儿女（包括外孙女）素质忠厚，聪明好学，学业成绩不错，我看到听到获得极大安慰，有时不觉笑出来，说明我精神愉快，心情

再对我去世，望不必悲伤，把它看成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就看开了，如果你们不克制住感情，那母亲更如何能忍受得起呢。你们要节哀应变，把母亲保护好，你们还要从为国家做工作着想，真正把悲痛化为推动工作和学习的动力，应该这样做。我记得幼年的时候，据说算命过不了50岁！当然这是瞎话，荒诞无稽，但我比上一辈任何人都活得长，七十几岁故去，也可称福享天年，寿终正寝，这样想就不必过于悲伤了。至于我身后之事，已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把处理的遗愿，请求医科院党组织批准，接受我的请求，望你们坚决照办，不要动感情不忍心做，更不要觉得我辛苦了一生，连后事都那么简单。我看这样做完全应该，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有益处，遗体交给组织上处理，干净利落，母亲千万不要去看，何必让她痛苦呢。要看就看我留下的那些彩色英姿照片，还有点可以安慰之处。

还有一点，领导上一定会对母亲给予恰当的照顾，一切按章行事，望务必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更不能使组织上处理为难。老友徐老本人身前是个标准共产党员，可是过世后，家属提出了组织上办不到的要求，反而对老徐身上抹了黑了。有什么困难，我相信你们能够共同设法克服的。我看昌文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原则性很强，我不如他，希望起个表率作用，大家向他看齐吧。对我们这样美好的家庭，更应该做到安定团结、无论兄弟、姊妹之间、妯娌之间，以至于夫妻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互相信任，互相谅解，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绝不要闹无原则纠纷，切忌争吵，这将是母亲最大的安慰。

我留下的一点衣服物品，完全由母亲做主分给各人，作为纪念，原则是各得其用，不必争议，我写给每家一幅字，虽非珍品，但是我的手笔，愿保留以供怀念。本来想给你们多写几张，可惜已来不及了。

我留下的一点衣服物品，完全由母亲做主分给各人，作为纪念，原则是各得其用，不必争议，我写给每家一幅字，虽非珍品，但是我的手笔，愿保留以供怀念。本来想给你们多写几张，可惜已来不及了。

吴征鉴同志遗愿



有些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需要向组织上反映的，已于今年初向黄乎副书记和科研处党小组长陈妙兰同志汇报思想时，向党交了心，我相信党组织会了解体谅我的为人。

父留言

一九八二年四月手术前

一个普通党员的遗愿

《人民日报》 1982年11月17日

读者推荐

编辑同志：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党委常委、医学昆虫学家吴征鉴同志，因患癌症于9月19日在北京逝世。他在今年4月写的《我的遗愿》，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建议你报发表。

中国医学科学院 王克宁

• • •

身后之事，还是早些交代为好。免得垂危之际，有话说不出。我的遗愿如下：

（一）去世之后，赶快做尸体解剖，希望利用它作为研究材料，不仅要查明死亡原因，而且能找出发病原因。尸体解剖如能做得多，做得细，再和病者的生前病历结合起来分析研究，一定能为今后诊治疑难病症提供新的技术和经验。还可以研究别的问题，收集教学标本。所以我希望把我身上值得研究或保留的东西都利用起来，这也是我在身后对提高医学科学水平应尽的一点责任。

（二）在尸检后，就把它火化，变成有机肥料。骨灰不用买盒子装，塑料袋一包就近送到西北旺药用植物场撒作肥田粉。

（三）绝不要开追悼会。这已成为习惯，好像很简单，却白白地花掉不少人、财、物力，几百个人去八宝山，大小汽车上百辆，光汽油费就可观了，不开大可节约。至于一个人离开人世，当然要通知大家一下，但方式越简单越好，发个讣告行了。

（四）关于我家庭安排，我已留言给子女们，我的老伴年老体弱，要他们坚持一个“孝”字，让她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上照顾，按章行事，不能特殊，我再三叮嘱家人不准提任何要求，使组织上为难，请放心。

总之，人总有一死，“死”了死“了”，自然规律逃脱不了，不应铺张浪费，而应一切从简。敬请党组织接受我提出的遗愿。

吴征鉴

【大彻大悟者的「遗愿」】

《人民日报》 1982年11月24日

望 汶

1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党常委吴征鉴的《我的遗愿》，称得上是一篇震撼人心的文章。自知病将不起，吴征鉴同志交代：自己的尸体供解剖；骨灰肥田用；不开追悼会；不准家人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寥寥数语，揭示了共产党人无私的博大的胸怀。

人生在世，所为何来？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作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共产党人的回答是：为人类造福。活着是这样，死也不改初衷。要说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共产党人可谓大彻大悟者。记不得哪位先辈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一个人光溜溜的来到这个世界，又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的想起来，名利总是身外之物，只是尽一个人的心力，使世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才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吴征鉴同志的遗愿，正是这一人生真谛的体现。

当然，如何安排后事，不是评价一个人的唯一标准。但从这“遗愿”可以看到，吴征鉴同志是无愧于共产党人这个称号的。

死者已矣，生者如何？无论是他的同辈，还是后代，都应该认真想一想。至于那些只知为自己及小家庭经营安乐窝的人，则当别论。

【讣 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医科院党常委、国家科委预防医学专业组副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疟疾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北京市科学学研究会理事、我国寄生虫病学和医学昆虫学专家、一级教授吴征鉴同志，不幸罹患癌症，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吴征鉴同志一九零九年出生于天津。在旧社会，他虽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投身于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但其专长得不到发挥。解放后，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解除人民的病痛，他进一步靠近组织，并于一九五六年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积极努力地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在寄生虫病防治研究中作出了新的成绩。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热情更高，工作积极，他满怀信心，要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医学科学事业。在病重住院期间，他还继续关心着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我院的建设，关心祖国的统一，关心着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吴征鉴同志是我国知名的寄生虫病学家。自三十年代初，他即开始从事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工作，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怀着满腔